

面对西方 两岸共同发扬儒学精神

□ 汤绍成

儒家文化乃两岸共同的文化基础，近年来，大陆推行尊孔的政策，将可拉近两岸的距离，并可借此探讨双方合作的可能性。2011年元旦 ECFA 生效，两岸关系得以进一步发展，接着在文化交流方面，更可以大力发挥，以便增进理解与建立共识，并为未来的两岸关系打好基础与创造条件。

近年来，中西方对于人权与价值的争论激烈，相形之下，我方的话语权仍显纤弱。但是，目前大陆政府在国际上向许多国家提供纾困协助，对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已做出重大贡献，这是否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这也使得西方国家错愕顿足，一方面需要大陆的支持，另一方面还批评中国的人权与价值问题，已陷入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①

目前，东风日盛，西风日衰，情势明显。近一步观之，东西方文化的竞合与较劲，正处于黄金交叉的关键时刻。若两岸能携手合作，截长补短，相互呼应，共同强化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角色与功能，并为解决当前国际困境提供软实力（soft power）与巧实力（smart power）的新思维，难免东风不会压倒西风！

一、儒学特色

在这一部分，本文先从儒家所主张的人性论出发，再检视儒家施政的主张，再加上中国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儒家的人权观与国际观等等。最后，再略述儒学思想对于欧洲的影响。

1、性善与性恶

传统中国和西方价值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对人性的基本主张。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仁”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该学说所主张的“性善”，^②是中华文化思想的主流（孟子：恻隐、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等）。进而，如孔子所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事实上，所有真正的教育，都是在唤醒学生自学与自律的意识。君子是有为有守，自主自立，那些无法自制的人，都必将受制于人。

而西方世界深受基督教文化所谓“原罪”的影响，^③因而性善的学说难以发展。例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 - 1679）^④所提：社会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的国家哲学，导致西方的法治充分发展，最后连国家的合法性都必须建立在合同之上（John Lock, 1632 - 1704；Jean - 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⑤而这也是导致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盛行的基础。

2、德政与法治

依照儒家的观点，法治主要的缺陷在于强者有权解释法律，因而得以欺负弱者。例如史班塞（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⑥，就助长了殖民帝国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发展，不但深化了西方世界内部的矛盾，比如资产阶级和贵族，以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等，再加上对非西方世界的殖民政策。当西方国家开始殖民时，

就是以圣经与炮舰来换取他人的土地与资源（原来你有圣经，我有土地；后来我有圣经，你有土地）。

而“仁”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但这既不抽象也不遥远，乃运用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教导人们应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但西方过分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因而产生强凌弱众暴寡的现象。相形之下，新儒学一贯主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尊重他人的权利而不欺压，因而新儒家可以缓解西方过于强调法治与权利所造成的后果。

3、人与自然

此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在过去三百年来，因殖民帝国主义不断追求财富，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的严重破坏。二战后，非西方国家也力图迎头赶上，因而更加恶化全球的气候。但新儒家主张，人与自然是不能分开的，怎能不珍惜物质与生命（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⑦而若能以新儒学为基础，借由教化与宣传来增强各国人民的物我关系与关怀意识，这对于改善全球的环境必有帮助。

在《礼记·礼运大同章》中，^⑧孔子描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平等权利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事实上，孔子更重视平等的权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保护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照顾全体人民的利益，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儒家还注重群体优先的原则，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然后扩展到国家和世界。特别是《大学》中所提倡的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及诚正修齐治平等），原则上团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这种调和个人与社会共同利益的立场，与西方个人和群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差异甚大。

4、环保与人权

在此还必须强调，若以西方的标准来判断

中国，那不但会失准甚至还是不道德的，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联。西方工业国家在早期的工业革命时期也产生了很多污染，但当他们发达之后才予以改进，同时将夕阳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现在大陆亦同，这不是一个共同的发展过程？西方国家有何资格批评别人？同时，这也涉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问题，工业国家是否应该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计算其排放量？

人权问题是另一个例子。根据《史记·管晏列传》，^⑨“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权的发展也有一定的阶段，归根到底要看各国的情况。在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的国家资产（保守估计约3500亿元人民币），来发展自己的工业。^⑩现在，他们要求中国采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极不公平。况且，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GDP占世界30%，但到了1950年，却只剩下3%，这不都是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所造成的结果？难道这些加害者不需汗颜与道歉？

因此，若将当前大陆的具体情况及其国际地位，与其10年甚至20年或50年之前的情况作比较，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言论自由尺度也明显放宽，国际地位更是日益重要，此乃与西方国家以其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的结果大异其趣。

5、国际观

依照儒学的观点，各个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自主决定如何与其它国家交往。因此，自古以来，中国一直对人忠诚，甚至以宽恕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无私与诚意。中国的对外政策也是以仁为基础，以便让其它国家受惠，朝贡体系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其它国家没有理由不与中国友好，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 - 1506）与郑和（1371 - 1433）就是中西双方最为明显的对照。^⑪郑和七下西洋，最远还抵东非，

但他从来没有占领任何土地或殖民，而哥伦布刚好相反，勿庸赘述。

质言之，中国传统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协助维系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国与国之间、国与地区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和欣赏，尤其应该尊重各自的历史与文化。因为每个人都是集“天地之精”所生成，但出生的地点与环境不同，所以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的习俗和价值观。如果中国人生在非洲，那中华文化必定是另种面貌。因此，人类的信仰与信念，无疑是一个理想世界的必要条件。为了创造世界长期的和平与发展，所有国家的现状都必须得到尊重。

依据儒家思想，每个国家都是自己的主宰，可以自主选择生活方式。西方国家经历了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②使得新兴资产阶级可以跳脱家长式的制度。这正如康德所言，“父权”（patriarchal power）是有史以来最独裁的政权，始终把人民当作不知好歹的子民，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其实是跳脱家长式政权的过程。但是，西方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与欺诈利用，并仍视此为白人的负担（white men's burden），如何自圆其说？

如今，中国大陆的崛起证明了非西方国家是完全能够自主且不需任何指导。如果中国大陆能，其它国家为何不能？重要的是，每个国家都应参照其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未来，而不是照搬他国的经验。几个世纪以来，国际交流也受到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影响甚深。如果这种交流只是重利轻义，其结果必然是弱肉强食，因此，儒家的道德原则当可补其不足。

这就是把其它国家视如自己，世界是一个大家庭。在传统上中国虽然被视为是“天朝”，对于周边国家都“厚往薄来”，从不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或强迫这些国家接受中国的价值观念。在此朝贡体系中，万国来朝，其

中主要的就是经贸、知识与安全的原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对于重建一个更加公正与公平的国际秩序，是否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思维？

若将1900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与当前的八国集团（G8）相比，其实只差在奥地利被加拿大取代，这些国家已经主宰世界超过一百年。这些国家都认为大国必霸，但从中国的传统和目前的对外与两岸政策观之，情况完全不同，目前正是两岸可以携手共同向国际发声与说明的好机会。

二、儒学的影响

早在17世纪，新儒学就对于欧洲的自由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乃因当时欧洲30年战争（1618-1648）结束之后，西方满目疮痍，相对中国正处于大清盛世，因而让欧洲各界产生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向往。^③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曾断言，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每个自我都是目的（自我目的，Selbstzweck），不能被当作工具，故必须强调道德与良心的作用，因为这才是“自我目的”的最佳表现。

事实上，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与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就是受到新儒学的影响，而他们两者的主张正好是康德先验唯心主义思想（transcendental idealism）的基础，康德所主张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④也就是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全面性与强制性）的道德规范，乃出于孔子的伦理学（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三、结语

总之，我们并不完全否定西方的价值，因为它可以为我们提供珍贵的参考。但所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都有其源起，是否可将西方的观念应用于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若将观念强加于人，更是一种野蛮的行

为。

比如欧盟和德国抗议台湾的死刑制度，就是最佳实例。也许是因为欧洲国家经历了战争和独裁的统治，他们坚信国家不应杀害自己的人民。然而，台湾地区及大陆都没有杀害600万犹太人或掀起战争。相反的，中华民族都是受害者，而不是战争的罪犯。当然，废除死刑是一个选项，未来是可以考虑，但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不需他人指点。目前有超过80%的台湾人民不能接受欧洲的抗议，欧方也应该理解。与此同时，西方应更谨慎判断东方的事务，以避免误解和不愉快的后果。

在过去的几年里，大陆的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已相当成功，这是否可以证明其优势？多年来，大多数的台湾人不能接受大陆的正面发展，在冷战时期还情有可原，但目前时代已经改变，现在是开始面对事实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所）

注 释：

①Only Britain can beg for scraps from China and tell them how to behave. David Cameron says he will drum up trade in China, and tackle human rights. It is an exercise in bluff concealing hypocrisy, Tuesday 9 November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0/nov/09/britain-beg-china-bluff-hypocrisy>.

②孟子的性善论及四端说, <http://www.slidefinder.net/%E5%AD%9F/%E5%AD%9F%E5%AD%90%E7%9A%84%E6%80%A7%E5%96%84%E8%AB%96%E5%8F%8A%E5%9B%9B%E7%AB%AF%E8%AA%AA/21121504>.

③吴罗瑜总编：《圣经新辞典》（下册），香港，天道书楼，1996；麦葛福编：《基督教神学原典精

华》，台北，校园书房，1998。

④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Now First Collected and Edited by Sir William Molesworth, Bart., (London: Bohn, 1839 - 45). 11 volumes, volume 4. The Leviathan.

⑤Michael R. Ayers, Locke. Epistemology & Ontology, Routledge, 1991; Richard Cox, Locke on War and Pea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⑥Thomas C. Leonard, "Origins of the myth of social Darwinism: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Richard Hofstadter's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1 (2009) 37 - 51.

⑦《宋史》，《张载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006b301000920.html。

⑧陈章锡：《论〈礼记·礼运〉的政教文化观》，<http://203.72.2.115/Ejournal/4012000902.pdf>。

⑨《史记》，《管晏列传》，http://art.pch.scu.edu.tw/classic_article_xuan%20du_PDF/52.pdf。

⑩《国弱之痛：近代中国究竟向列强赔了多少款？》http://www.360doc.com/relevant/4204248_more.shtml。

⑪朱苏进、陈敏莉：《郑和》上下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时平：《郑和时代的中国海权》，昆明，晨光出版社，2005年；张研：《郑和下西洋》，台北，云龙出版社，1992年；Gavin Menzies, 1434. The Year A Magnificent Chinese Fleet Sailed to Italy and Ignited the Renaissance,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Hammersmith, London, 2008.

⑫William Burns, Scie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An Encyclopedia, 2003; Harvey Chisick,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lightenment, 2005; Dorinda Outram, Panorama of the Enlightenment, 2006.

⑬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39-469页。

⑭Immanuel Kant, translated by James W. Ellington [1785] (1993). 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3rd ed. Hackett. pp. 30-43.

（责任编辑：潘林峰）